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0 年 12 月 28 日)

1、大西洋理事会分析美国及盟友应对中国的战略计划

12 月 21 日，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副主任马修·克洛宁（Matthew Kroenig）等人合著文章《2021 年全球战略：应对中国的联合战略》。文章认为，二战后形成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目前面临大国竞争的考验。中国受益于现行世界体系，并不想将其全盘推翻，但希望利用自己的力量改变某些规则，增加收益。这不同于过去的美苏冷战，苏联对美国有着直接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威胁，美苏在经济和社会上几乎没有相互依赖，而中国则是诸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在经济相互依赖的情况下，与中国完全脱钩将付出极高的代价，因此美国必须在竞争的同时兼顾合作。文章认为，美国首先需要加强盟友关系，建立基于规则的体系，以迎接大国竞争的新时代。第二，美国及其盟友应防范中国可能破坏现行体系原则的行为，减少中国的影响力，必要时威慑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的军事行动。作者同时表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可以与中国接触，就共同利益（公共卫生、全球经济、防扩散和全球环境）进行合作，最终将中国纳入一个振兴的、经过调整的“基于规则的体系”。这一战略的目

的不是持久的竞争或推翻中国共产党，而是让中国领导人相信，在“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内合作，比挑战它更有利于他们的利益。美方需要既关注双方关系中的竞争，也关注合作的可能性。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global-strategy-2021-an-allied-strategy-for-china/>

2、美国前驻华公使：美国与中国对抗是为了捍卫霸权而非安全

12月25日，美国独立新闻网站“灰色地带”（The Gray Zone）发表了与美国前驻华公使、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Freeman）关于美中“新冷战”话题的访谈实录。首先，傅立民认为，“新冷战”一词对于目前的美中关系定位具有误导性，中国从任何方面看都不是前苏联。其次，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共产党900万党员与整个中国社会作了虚假的区分，傅立民认为这会激怒中国人民，不是恰当的外交政策。且他认为应当称中国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为挑战而非威胁更合适。在拜登政府时期，美中之间在台湾、香港、新疆问题上的矛盾将继续存在，台湾问题将是日后美中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关键点。最后，关于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采取了更强硬立场的问题，傅立民认为，北京曾被美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长达23年之久，甚至被阻止以任何角色出现在国际组织中。所以当中国加入联合国时，基本上是一种学习模式，在使用否决权上一直非常谨慎。直到现在，中国人比以前更加自信，坚持

捍卫自己的利益，包括维护与《联合国宪章》相符的主权相关利益，反对领土吞并。这一立场在叙利亚、科索沃、克里米亚等领土主权问题上都有体现。

<https://thegrayzone.com/2020/12/25/veteran-diplomat-us-confronts-china-to-protect-supremacy-not-security/>

3、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院称中国并非以色列头号国家安全威胁

12月21日，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院(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SS) 网站发布其中国项目主任、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规划局战略司司长阿萨夫·奥里昂(Assaf Orion)撰写的文章《“中国是美国头号国家安全威胁”——对以色列也是吗?》。作者指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近日在一篇文章中将中国列为美国的头号安全威胁，声称中国寻求“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主宰美国 and 整个地球”，呼吁美国盟友警惕中国的挑战并作出适当回应。作者认为，以色列不是美国，中国没有威胁要把它从其现有地位推开，中国军方也未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外交政策本质上是实用的，意识形态因素很少发挥核心作用。以色列将中国视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但美国的力量和支持是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基石，当中国被美国定义为头号威胁时，以中关系的边界也会发生变化，无法期望“一切照旧”。中国不是以色列的头号威胁，因此以色列不应直接借鉴美国政策，而应根据自己的独特特征和需求制定政策。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china-threat/>

4、《外交政策》：美国幸运的历史就要结束

12月23日，《外交政策》网站发表由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撰写的评论文章《美国幸运的历史就要结束》。文章认为，一系列幸运的情形促使了美国的崛起及其全球霸权，这些情形不太可能会持续下去。美国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从诞生以来就几乎不用担心被入侵等风险。欧洲的纷争使得美国可以一次又一次地从诸如入侵加拿大等错误中几乎毫发无损地走出来，不断在美洲扩大影响力。美国的幸运也表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选择了实力远逊于自己的敌人。苏联是美国遇到的最强大的敌人，但是其实力依然逊于美国，冷战的结束更多是因为苏联自身的崩溃而非美国的打击。但是，现在美国不再享有地理屏障带来的绝对安全，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一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伤亡的总和；俄罗斯等外部势力可以通过网络空间打击美国政府。作为美国的新对手，中国在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新冠疫情的有效管控也为中国经济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美国同时还面临着诸多国内问题，如社会分裂、以“自由”为借口，拒绝防疫措施，助长疫情及游说集团通过金钱把控朝野。总而言之，美国面对挑战不能再靠运气。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2/23/americas-history-of-luck-is-running-out/>

5、《国家利益》：拜登政府可能会成为奥巴马的第三任期

12月26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由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经济政治项目政策主任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撰写的评论文章《拜登政府只代表奥巴马第三任期吗？》。拜登政府主要由曾经在奥巴马政府工作的人组成，实际上可能是奥巴马的第三个任期。拜登可能会寻求在一些问题上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但民主党外交政策精英和共和党人对中国的看法比四年前更加严厉。因此，拜登政府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试图恢复奥巴马的多边战略，即建立联盟来对抗中国。拜登政府可能会强调美日印澳“四方同盟”。民主党的外交政策精英们比共和党的同行们更亲欧、更恐俄。美国民主体制的非理性敌意不仅延伸到俄罗斯，还延伸到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保守社会的民主政府，拜登曾谴责这两个国家为“极权主义国家”。在中东，拜登政府可能会牺牲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独裁国家的帮助下，巩固美国的军事存在。任何削减开支的暗示都会受到支持拜登的两党外交政策建制派的谴责，所以不能指望拜登会终结美国现在进行的战争。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ill-biden%E2%80%99s-administration-simply-represent-third-obama-term-175107>

6、《国家利益》：应延长美国众议员任期以改善政治极化

12月26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由记者詹姆斯·罗

森（James Rosen）撰写的评论文章《美国失序的政治能被修好吗？》。文章认为，将众议院议员的任期延长到四年，会有效地改善美国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党内冲突和两党对立正在扼杀美国，传统政党等级制度受到了侵蚀，对美国解决国家问题的能力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由于党内政策整合力的下降以及愈发严重的两极分化，美国政客选择泛化国家安全，以此争取更多的国内支持，但是这一方式不断限制着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选择与行为。在现代政治和大众媒体的现实条件下，两年的任期几乎不可能让议员在为下一轮竞选做准备的同时，专心从事立法。如果将众议院成员任期改为四年，这将允许众议员关注更宏观的利益，党内派别之间与对立党派之间也更容易达成妥协。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an-americas-broken-politics-be-fixed-174973>

7、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分析 2021 年欧洲发展走向

12 月 16 日，法国国际关系学院（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Ifri）网站发布其院长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Thierry de Montbrial)撰写的文章《世界中的欧洲：为了温和有效的改革》。作者指出，除疫情之外，美中竞争加剧和拜登-哈里斯组合在美国大选中获胜成为数月来主导国际局势的主要事件。即使在 2019 年，欧洲也未曾担心“中国威胁”，西方对中国看法的转折主要源于特朗普的攻击。可能出现的“新冷战”在欧洲和亚洲引起了广泛忧虑，因为这些国家

不愿被迫在美中两国之间“选边站”。欧洲的现实主义者忧心以民主党人为代表的美国政客继续以民主为由发动颜色革命，这是苏联解体后俄欧矛盾未能和解的根本原因。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签署释放了支持自由贸易的积极有力信号。欧洲应更多关注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尽管自苏联解体后，跨大西洋联盟的宗旨不再明确，但欧盟成员仍将致力于维护这一伙伴关系，但需要警惕美国借此构建反华联盟的风险。欧洲的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技术主权（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的概念已获德国认可，这可以取代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概念，为致力于促进欧盟整体利益做出贡献。

<https://www.ifri.org/en/publications/editoriaux-de-lifri/europe-world-modest-and-effective-reform>

8、RSIS 刊文分析新冠疫情对东盟灾害治理的影响

12月23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SIS）网站发布人道主义和减灾项目研究员龚丽娜（Lina Gong）和南希尼（S. Nanthini）撰写的文章《COVID-19 催化剂：对东盟灾害治理的影响》。文章指出，灾害治理能力建设是构建东盟共同体恢复（resilient）能力的关键要素。近二十年来，随着一系列区域框架、机构和设施建设推进，东盟已成为重要的减灾行动区域行为主体。现有体制下，洪水、干旱和台风等自然灾害应急行动的优先级位居流行病和工业事故应对之上。而

新冠疫情揭示了东盟对防护设备、消毒产品和疫苗等非常规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且传统的应急储备无法满足紧急需要。为此，东盟各国需要一致应对，在管理体制和财政资源协调上取得突破。此次疫情暴露了东盟灾害管理中决策、应对能力和机构建设方面的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推动基础设施和后勤系统的多功能改造，增强了协调行动的机制化水平。
<https://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nts/the-covid-19-catalyst-implications-for-disaster-governance-in-asean/#.X-lAoC21FQK>

9、RUSI 刊文分析美国对伊朗政策的主要影响者

12月22日，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RUSI）网站发表“核威胁倡议”协会（NTI）副主席科莉·辛德斯坦（Corey Hinderstein）的文章《美国对伊朗政策的主要影响者》。文章指出，至少有三方人士可能影响拜登政府的伊朗政策。一是行政部门内的决策机构，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不仅限于核问题，拜登政府时期管理和确定双边关系优先事项的方式可能会有所变化，具体取决于负责机构间政策协调的人士。二是利益集团，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会在塑造公众和政府对于伊朗认识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媒体仍将是左右对政策决策或实施成功与否的看法的主要影响者。三是其他利益相关者，例如英国、法国、德国和整个欧盟，很可能被要求在伊朗去核化问题上扮演积极角色，而英国在解决伊朗核问题和增强地区安全的下一步行动中必须发挥核心作用。

<https://rusi.org/commentary/key-influencers-us-policy-iran>

10、布鲁金斯学会分析美墨安全关系倒退危机

12月21日，布鲁金斯学会发表安全、战略和技术中心高级研究员范达·费尔巴布-布朗（Vanda Felbab-Brown）所著文章《美墨安全关系的危险倒退》。去年10月，美国在洛杉矶机场逮捕被指控贩毒和腐败的墨西哥前国防部长萨尔瓦多·西恩富戈斯(Salvador Cienfuegos)。在压力下，墨西哥军方、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和他领导的莫雷纳党(Morena party)挑起民族主义主权情绪，迅速起草并通过了一项新法律，严格限制外国执法人员在墨西哥的行动（比如外国执法人员需要向墨西哥联邦政府每月报告自己的信息和活动）。该法律使墨西哥与国际执法机构的合作陷入瘫痪，并摧毁了美国与墨西哥之间仅存的信任和有意义的执法合作，是对双方都很不利的决裂。墨西哥政府、军队和执法部门目前受到犯罪集团的高度渗透，该法律破坏了墨西哥执法部门根除腐败的努力，削弱了墨西哥州长和地方警察部队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建立更有效警察部队的的能力，甚至增加了美国在墨西哥执法人员的人身风险。文章认为，拜登政府可以对新法律采取强硬态度，比如停止批准墨西哥的引渡请求，加强对居住在美国的前墨西哥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的逮捕力度，或削减对墨西哥执法机构和军方的财政援助。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12/21/a>

-dangerous-backtrack-on-the-us-mexico-security-relationship

撰稿人：吴迪、崔元睿、聂未希、邴钰惠

审稿人：马国春、黄萧嘉